

美国对华外交秘录

毛泽东的胜利 与美国外交官的悲剧



〔美〕

伊·卡恩 著

隋林

译

责任编辑：白国超
叶云珠

毛泽东的胜利与美国外交官的悲剧

[美] 伊·卡恩 著
徐隋林 刘润生 编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青年报社印刷厂 激光照排·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180 千字

1990 年 9 月第一版 1990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014—0554—9/D · 329

定价：4.00 元

内容简介

这是发生在标榜“民主”、“人权自由”的美国的特大政治冤案，是由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彻底失败引起的。

在 40 年代，“美国驻国外的一批最能干的年轻外交官”，在同毛主席、周总理及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接触后，预见到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前途。于是，在他们向美国政府呈送的报告中，要求调整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积极主张。就是因为这些，他们受到了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耸人听闻的粗暴压制。在 50、60 年代，这些外交官在美国普遍遭到了公开的、秘密的审查，甚至被捕入狱。精神上的痛苦折磨、人格上的严重侮辱，生活上的颠沛流离，结成了一条可怕的铁索。他们的子女、亲属、好友，都曾遭到株连。直到 1973 年中美建交，这些人的苦难才有幸结束。

本书以极为丰富的、鲜为人知的生动材料，描写了这一批外交官的坎坷经历。除了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外，对我们正确地认识和了解美国的“民主”、“人权”、“自由”的实质，正确地认识和了解中美关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目 录

一、北京。周恩来请来了一位特殊的美国客人

- 1. 谢伟思转道中国，基辛格诡秘会晤 (5)
- 2. 周总理突然召见 (8)

二、一流的中国通是“亲共分子”

- 3. 悔悟：本来不可能有朝鲜战争；本来不可能有台湾问题；本来不可能有越南战争的升级困境 (11)
- 4. 中国通各自的遭遇 (20)
- 5. 有人朝肯尼迪开枪 (29)

三、美国外交官在中国

- 6. 险象环生 (34)
- 7. 外交官趣闻录 (40)
- 8. 妓女风波 (46)

四、出生在中国的美国外交官

- 9. 戴维斯 (50)
- 10. 谢伟思 (54)

五、日美开战前后的插曲

- 11. 美国忽视了紧急军事情报 (64)
- 12. 外交官落入日本魔爪 (66)

六、驻华美军司令部秘密

- 13. 外交参谋的内幕 (69)
- 14. 会晤周恩来、林彪后的重要报告 (78)
- 15. 两军对峙：如何看待毛泽东的中国 (81)

七、迪克西行动之谜

- 16. 颇有见地的主张 (89)
- 17. 压力，来自美国总统；抗衡，蒋介石终于受不住 (94)
- 18. 迪克西使团在共产党总部 (99)
- 19. 毛泽东八小时纵论的秘密 (103)

八、美国撮合中国统一的流产

- 20. 总统特使其人 (106)
- 21. 特使倏忽至延安，毛泽东称心如意 (121)
- 22. 特使突然变卦，毛泽东大发雷霆 (125)
- 23. 驻华美军司令的更替者 (127)

九、美国驻华使馆的秘密

- 24. 大使掏出了手枪 (133)
- 25. 毛泽东决计赴美 (137)
- 26. 外交官反叛事件 (142)
- 27. 毛泽东对美国的政策；赫尔利一意孤行 (146)

十、共产党间谍案

- 28. 谢伟思落入间谍网 (152)
- 29. 陪审团审理定案，谢伟思派驻日本 (157)
- 30. 大使被总统缴械，赫尔利蓄意挑起波澜 (163)
- 31. 来自日本的辩解 (169)

十一、风雨飘摇的美国对华政策

32. 马歇尔完成不了使命 (174)
33. 拉森的怨恨 (177)
34. 驻华新大使与外交官的境遇 (183)
35. 惊愕：人民解放军全副美式装备 (189)
36. 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 (192)
37. 中共宣布：美国驻华外交机构是非法的
..... (198)

十二、悲剧——已拉开了序幕

38. 谢伟思“亲共”罪名被开脱 (201)
39. 柯乐布衷告遭审查；麦克阿瑟小瞧中国人
..... (212)
40. 文森特受审 (217)

十三、愈演愈烈的悲剧

41. 谢伟思重遭审查；柯乐布被迫退休 (223)
42. 危险信号 (229)
43. 文森特沮丧的选择 (231)
44. 戴维斯被解职 (240)
45. 株连 (244)

十四、非常奇特的转折

46. 谢伟思复职前后 (250)
47. 戴墨镜的可疑人到了日本 (258)
48. “我只求得到信赖。” (261)
49. 谢伟思出击 (263)

十五、记住：钟摆是会往回摆的

50. 不是虚构：尼克松从中国活着回来；谢伟思在国务院赢得欢呼声..... (268)
51. 刺耳的噪音..... (279)

一、北京。

周恩来请来了一位特殊的美国客人

1. 谢伟思转道中国，基辛格诡秘会晤

1971年，当中美两国紧闭的大门尚待启开的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通过在北京的一位美国客人发出邀请，欢迎四位在美国影响很大的中国问题专家谢伟思、费正清、文森特和拉铁摩尔到北京访问。

随即发出的请柬写明：谢伟思夫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同时去访问的其他许多访问者一样，将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协的客人。

这个间接的邀请通过《纽约时报》转给了谢伟思，他立刻表示接受；同时，有人愿意向他提供到香港的往返飞机票。卡罗琳·谢伟思也受到邀请，不过，她的路费是由丈夫支付。

对他去中国，美国国务院没有表示反对，谢伟思就写信给周恩来和他在延安时代的老朋友、当时任中国驻加拿

大大使的黄华。不到两个星期，谢伟思就得到通知，说他可以到渥太华领取签证。他到渥太华后，受到黄华的设宴招待。谢伟思对黄华说：我预计要向政府报告此行情况。黄华请他放心，人民共和国那方面没有问题。

谢伟思于 1971 年 9 月 26 日抵达北京，在中国呆了六个半星期。他用大部分时间进行例行的旅游访问——访问工厂。在一家工厂里，他高兴地发现了一种中国制造的质量很高的防水蒸汽阀门。他参观了水力发电工程、动物园以及几家医院。在医院里，象通常那样，医生作了用针刺来代替传统麻醉剂的表演。他们还到了南京、上海、杭州和广州这样一些游客常去的地方。

在谢伟思的要求下，他们重游了北方和西北的某些地区。这些地区他是太熟悉、亲切了：重庆、延安，特别是成都。那里，从 1949 年以来就很少有西方人去过，因此，谢伟思的到来吸引了一大群人。谢伟思事后以其特有的羞怯口气回忆说：“我的中国话虽然生疏了，但还能听得懂，也还能答上一半。”他父亲的基督教青年会已为一个防疫所接管；原布道团的住处则住着 14 户人家，他们没有一个人听说过他的名字。

谢伟思回到美国以后，他遇到的每个人差不多都问起国防部长林彪的情况。他老老实实地说明他一无所知，因为他没有追问过这个问题。他也没有要求同毛泽东见面。他总觉得这类事情总得由毛主席提出才好。谢伟思亲切愉快地重逢了马海德博士，他们在延安时曾同住过一个窑洞。

谢伟思很想再见一次周恩来总理。他通过中国人民友

好协会转达了这一愿望。刚到中国时，他曾在一次盛大的宴会上匆匆地见了总理一面，但是没有机会交谈。他和妻子在中国各地旅行的时候，再也没有得到周恩来的回话。谢伟思开始怀疑不会有回话了。他知道总理很忙。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一次为在北京的美国人举行的宴会上，他再次见到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虽然对他表示颇为关切，亲热地同他打了招呼，但没有谈及单独会晤的事。

不久，神秘的基辛格到了北京。这是他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的几次旅行中的一次。基辛格非常了解谢伟思在美国的处境。他认为，美国政府官员在国内不能公开对之征求意见的人，在国外秘密地去征求他的意见，是完全正当的，并且不会引起舆论界的注意。因此，基辛格要求同谢伟思秘密会晤。

谢伟思按照礼尚往来行事，表示了同意，并取得了东道主中国的同意和安排。

这次会面的安排，充满了典型的基辛格式的诡秘气氛。会谈似乎没有什么结果。同美国大多数老资格的参议员一样，基辛格似乎不知道谢伟思曾经见过毛泽东，更不了解毛泽东曾与谢伟思进行过一次 8 小时之久的长谈（后面将作全面介绍）。

此外，基辛格怀疑谢伟思和他谈话的那个房间早装了窃听器，所以，在拘拘谨谨的简短谈话中，他不时地打量着房间的各个角落，象在侦探什么似地。而后，诡秘的基辛格建议回到加里福尼亚再碰头，或者到圣克利门蒂安全

可靠的环境中再见面。此后，实际上谢伟思就再没有听到他提起此事了。

2. 周总理突然召见

在谢伟思结束中国的访问的前一天，他突然受召去见周恩来总理。他毫无思想准备。

在开始时，周恩来关切地提到谢伟思所经历的艰难时刻，又问起了他们的某些共同的朋友——包瑞德、戴维斯、埃默森、文森特，等等，并且说，如果他们到中国来，当然也一样受欢迎。

接着，周恩来开始了有关世界大事的 3 小时的谈话，从戴高乐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到尤关注重的台湾地位。

周恩来总理在谈话中提到，如果蒋介石放弃他在台湾的政府，北京将乐意在人民共和国的政府里给委员长安排一个光荣、体面的位置。这是统一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决策情报。谢伟思没有把这个重要秘密情报传送给参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也许他认为没有必要再去惹一身麻烦。

1972 年 2 月，在尼克松总统前往中国前一星期，谢伟思同密执安州立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卢登和科恩，应邀再到一年前曾欢迎过他的外交委员会去。照他的说法，为的是去叙旧，谈谈“由于 40 年代有关中国的某些见解和建议而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的美国人”的情况。他又说：“自己最近对中国的访问就已表明，至少对我来说，中国今天许多情况的根子，从我们在 1944 年到 1945 年从共产党根据

地延安所看到、所报告的情况中也许就能找到我认为，我们卷入越南、我们坚持遏制中国、防止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很重要的一个根源是我们对于中国人、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及其领导人的意图，存在误解和缺乏认识。我们把他们设想为一个有侵略性的国家，而我不相信他们真是这样。因此，我认为我们之所以进入越南，主要是出于我们对中国的误解和没有根据的恐惧心理。”

科恩教授则说，“赫尔利将军在1945年末辞去大使职务的时候，留下了一大堆不负责任的指控，这使那些野心勃勃的政客们如获至宝。”科恩认为，对谢伟思、文森特、柯乐布和戴维斯的羞辱是“美国历史上的最可耻、最富破坏性的插曲之一”。他们四个人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保险高于那些谴责他们的人，但是对他们所造成的人身损害是永远无法弥补的。

卢登的发言幽默而具讽刺性。他认为，重新发现中国的竟是尼克松政府，这是“很有趣的”；他又说，他真想用“啼笑皆非”这个词。

参议员富布赖特对卢登说：“根据你的经历，你是有资格感到啼笑皆非的。”

在中美关系开始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性的前夕，富布赖特还说了这样的话：“美国人发现，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难做到通情达理、心平气和地讨论中国问题的年头太多了我们曾认为，只有我们自己才有资格扮演中国救世主的角色这些驻外官员很好地为他们的国家效了劳，而他们的国家却不总是很好地酬答他们。他们被调出了中国，剥夺

了他们应得的提升机会。他们的忠诚受到怀疑，有的被排除于外交工作之外。结果是让大家认为，一个人，不管他是不是政府工作人员，写出‘真正’中国的情况，都是不聰明、不保险的就这样，从40年代末期以来，有关中国的许多文章，都无非是一种符咒语。”

参议员富布赖特为纠正过去的错误所做的努力，虽然不是普遍受欢迎的，但受影响者却深为感激。

在不到一年以后的一位中国通——文森特的追悼会上，曾在文森特下面工作过的莫法特说：“我很高兴，现在终于公开当时驻中国的某些外交官的深刻报告和透彻分析了。但是，公众还不那么了解的是，当时交给文森特艰巨得多的任务，那就是考虑和估价所有来自中国的报告，凭着这些报告以及他对报告作者及其能力和理解力的了解，加上他自己在中国的多年经验，尽可能地确定基本的事实和~~发展趋势~~，然后向国务卿提出他认为是应该采取的政策的建议。人们只是现在才认识到，文森特的智慧比之以后毁损他的那些人的智慧到底要高出多少。”

另一位颇有影响的外交官接着说：“人们也许会考虑，对过去种种事件和罪行的透彻省悟，会给我们以怎样的教训。这种考虑使我们有理由揣想：如果我们的驻外官员队伍都是由文森特这样的人组成的，我们今天就不会去打一场谁也不需要的战争了；将来我们也不会去冒险进行没有人需要的战争了。而且，我们今天就会有这样一支驻外人员的队伍，它不仅能顶住任何麦卡锡式的进攻，而且它能拥有深受公众爱戴的荣誉。”

二、一流的中国通是“亲共分子”

3. 悔悟：本来不可能有朝鲜战争；本来不可能有台湾问题；本来不可能有越南战争升级的困境

在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竞选的角逐场上，肯尼迪和尼克松举行了四场著名的电视辩论。两人全神贯注的大问题是金门和马祖的命运。这是位于亚洲大陆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中华民国之间的两个小小的岛群。关于美国对金门和马祖可能或应该怎么办，两位总统候选人的意见有分歧，但他们一致认为，毫不动摇地支持蒋介石统辖的台北共和国，对于美国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

1960年秋，美国的许多事件都要受对华态度的影响。那时候，外交官中仅有两位中文专家，德鲁姆赖特和赖斯。前者当上美国驻台北的大使，后者则是国务院政策计划班子的成员，在肯尼迪赢得大选一年之后，他还当上远东事

务助理国务卿帮办。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乃至今天，仍然做着与中国有关的工作。

战争爆发时，有 20 多位象他们这样的专家在中国工作。但是，在战胜日本后的 15 年里，即毛泽东在中国取代蒋以后的 11 年里，外交官中其余的“中国通”都被调走或撵走，他们不得参与重大的对华事务了。理由是，“丢失”中国，他们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丢失中国的并不是他们。他们当时的权限既丢不了也保不住中国。

中国是经历了一场剧烈的、也许是无法制止的革命之后，被蒋介石丢掉了，而被毛泽东得去了。如果说有什么外界影响帮助毛泽东取得了胜利的话，那就是 30 年代日本的侵略行径，肯定要使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美国外交官的失职或尽职行为黯然失色。即使要是把蒋的垮台归咎于美国人，也不应归咎于职业外交官，而是应归咎于一位狂妄自大的非职业外交官，即 1944 年 11 月 17 日被罗斯福任命为驻重庆的大使赫尔利少将。

从那一天起，美国两大政党都觉得自己已同中国问题缠在一起，无法摆脱。参议员罗伯特·塔夫特的言论具有代表性。他说，“国务院内有一个亲共集团一有机会就宣传共产党在中国的事业。”塔夫特是共和党的良知，而且是该党高级发言人之一。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要共和党人阿瑟·范登堡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他说，蒋介石“被出卖了”。

可笑的是，从来没有任何美国人被指责丢失了俄国。被

排斥在美苏关系有关的事情之外的仅有乔治·凯南。这不是因为他容忍共产主义，而是因为他过于反对共产党。

中国的丢失，成了美国外交神话中的被人念念不忘的事，以致于后来联系共产党的成就时，常常要老调重弹。1960年秋，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这是一个希望尼克松击败肯尼迪的人领导的调查小组），发出一份新闻公告说，“古巴是被美国人交给了卡斯特罗和共产党的，就象把中国交给了共产党一样。”

几个月以后，参议员多德说：“我相信这些人只是判断错误。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中国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丢掉了中国的真正原因”

已被惩罚了很久的中文专家之一文森特，在1953年初春曾向刚刚成立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主动提出过意见。到1960年，文森特说：“作为一个老中国通，我建议新政府抱着很真诚的目的，调查研究关于我们‘丢失’中国的说法。这完全是院外援华集团捏造散布的说法。请抛弃它吧。那时，只有在那时，政府才能在职业外交官的帮助下，制订并执行客观的对华政策。”

几个月后，国务院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揭示，只有百分之七的美国人认为驻外处外交官丢失了中国。而多得多的人则认为，根本原因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虚弱。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共和党政府非但没有抛弃老的想法，却一下子把文森特开除了。

另一个老中国通是谢伟思，他在“丢失中国的人”的名单上，始终名列前茅。尽管他思想上一直在考虑不能丢

失中国。例如，谢伟思在 1944 年 3 月 20 日向上级报告说：“中国的情况一团糟蒋介石，也只有蒋介石应对整个这种不幸的局面负责如果他所依赖的美国下定决心要从蒋那里得到什么这可能意味着积极参与中国内政。但是，我们要是不这样做，就无法把中国当作盟国。而我们这样做，却有可能挽救中国。”

谢伟思也被赶出了政府。不过，多亏最高法院，他在非自愿地离职 6 年之后，勉勉强强地被恢复了国务院的职务。谢伟思是所有老中国通中被搞得最臭的。他在 1960 年 50 岁时，身体非常健康，但他经常想自己死后的讣告大概怎样写。他十分肯定地说，讣告将称他是被控丢失中国人之一，称他是 1945 年著名的“《亚美》杂志案件”中最具体地被控犯有间谍罪的人。

反复使用“约翰·谢伟思”，起到了把他与他两个主要同事——约翰·文森特和约翰·戴维斯——组成同名阴谋网的作用。到了 1960 年，有相当多的不大注意外交史的人已经分不清这三个人，更不用说把他们与其他人，如外交官、老前辈汉学家约翰·费正清区别开来。显然，这只是因为这位外交官的名字也叫约翰。

到了 1971 年，谢伟思可以苦笑地谈论这一切由于名字的混乱而造成的笑话了。在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解后，谢伟思、戴维斯和费正清一起到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他回想起过去有人曾经把蒋介石的中国的覆亡归咎于四个“约翰”——谢伟思本人、约翰·戴维斯、约翰·费正清和“约翰”介石。他这番话引起了哄堂大笑，这是因为约翰的